

士大夫和书院 互动关系研究

赵连稳◎著

ZHAOLIANWEN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士大夫和书院 互动关系研究

赵连稳◎著

ZHAOLIANWEN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士大夫和书院互动关系研究 / 赵连稳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3

ISBN 978 - 7 - 5203 - 1985 - 0

I. ①士… II. ①赵… III. ①知识分子—研究—中国—明清时代
②书院—教育史—研究—中国—明清时代 IV. ①D691. 71②G649. 29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15722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安 芳
责任校对 张爱华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1
插 页 2
字 数 344 千字
定 价 8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一 国内研究状况述评	(1)
二 士大夫阶层的演变	(7)
三 士大夫的人生价值观	(10)
四 士大夫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作用	(13)
五 书院历程	(16)
六 士大夫和书院之互动	(22)
七 研究内容、思路和方法	(23)
第二章 唐末至元朝士大夫和书院互动关系	(25)
第一节 唐末至元朝的社会文化环境	(25)
一 有利书院发展的文教政策	(25)
二 三教合一,理学产生	(29)
三 科举制度和官员选拔	(32)
四 印刷术进步和出版业的发展	(37)
五 官学衰败、私学兴盛和书院发展	(40)
第二节 唐末至元朝士大夫对书院发展的作用	(46)
一 士大夫与书院发展	(46)
二 官员对书院的控制	(65)
三 士大夫支持书院发展的原因	(67)
第三节 唐末至元朝书院对士大夫的影响	(71)
一 培育士大夫价值观	(71)
二 培养大量士大夫	(90)

第三章 明代士大夫对书院发展的作用	(98)
第一节 明代的书院政策	(98)
一 洪武至宣德年间的书院政策	(98)
二 正统至正德年间的书院政策	(100)
三 嘉靖至崇祯年间的书院政策	(104)
第二节 明代官员对书院发展的作用	(109)
一 创办书院	(110)
二 筹措经费	(115)
三 书院讲学	(117)
四 选拔山长	(119)
五 规范发展	(120)
六 增加藏书	(122)
七 禁毁和控制	(123)
第三节 明代乡绅对书院发展的作用	(125)
一 创办书院	(125)
二 公举山长	(131)
三 捐献经费	(131)
四 管理经费	(132)
五 书院讲学	(134)
六 制定学规	(135)
七 增加藏书	(137)
第四章 明代书院对士大夫的影响	(138)
第一节 明代书院和士大夫价值观培育	(138)
一 书院教学	(138)
二 书院祭祀	(144)
三 书院学规	(147)
四 山长的言传身教	(150)
五 书院自然环境	(153)
第二节 明代书院和士大夫培养	(154)
一 培养了大量官员	(154)

二 培养了大量学者	(162)
第五章 清朝士大夫对书院发展的作用	(166)
第一节 清代的书院政策	(166)
一 顺治和康熙时期的书院政策	(166)
二 雍正时期的书院政策	(169)
三 乾隆时期的书院政策	(171)
四 嘉庆、道光和咸丰时期的书院政策	(176)
五 同治、光绪前期的书院政策	(179)
六 光绪后期的书院改制	(181)
第二节 清代官员对书院发展的作用	(184)
一 创办与修复书院	(185)
二 经费筹措与管理	(198)
三 书院讲学	(208)
四 山长选拔和管理	(216)
五 书院藏书和管理	(217)
第三节 清代乡绅对书院发展的作用	(219)
一 书院创办与修复	(220)
二 书院讲学	(225)
三 经费筹措	(227)
四 书院管理	(233)
第六章 清代书院对士大夫的影响	(246)
第一节 清代书院与士大夫价值观培育	(246)
一 书院教学	(247)
二 山长的言传身教	(254)
三 书院祭祀	(260)
四 书院规章	(265)
五 书院建筑环境	(277)
第二节 清代书院与士大夫培养	(279)
一 培养了大批官员	(280)

二	培养了大批学者	(287)
三	培养了一批维新派和革命家	(292)
 第七章 结语与思考		
一	士大夫在书院发展过程中的推动作用	(296)
二	士大夫热心书院教育的原因	(300)
三	士大夫和书院能否相向而行的原因	(304)
四	明清时期南北方书院发展状况的区别	(308)
 参考文献		
后记		

第一章

绪 论

士大夫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中坚力量，书院则是培育人才的主要场所，士大夫和书院是一对难兄难弟，不离不弃，走过了千余年的历程。士大夫创办、发展了书院，书院则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士大夫，两者的互动推动了我国传统社会的发展。唐末五代以后，士大夫和书院两者基本上实现了良性互动，而明清时期尤其具有典型性，因此，书院也发展到了普及化的程度。对我国古代士大夫和书院的互动关系进行系统梳理和研究，是一个很具意义的学术课题。

本章将对学术界有关该问题的研究状况进行回顾，并且阐述士大夫和书院的简要发展历史，为以后的研究起到铺垫作用。

一 国内研究状况述评

我国学术界对书院的研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一个时期从辛亥革命开始到 1949 年，这一时期，由于人们逐渐发现了近代新式教育的弊端，便转而关注古代书院教育，企图以书院精神弥补新式教育的缺陷。自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蔡元培、胡适、梁启超、毛泽东等人对书院的研究，多限于书院史的探讨，于士大夫和书院互动关系方面的探索则很少。

士大夫和书院的关系问题至今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几乎处于空白状态，所以无法对此进行述评。但是，在有关书院的研究成果中涉及两者的关系，这方面的成果还比较多，而有关研究士大夫的成果中则基本上没有涉猎两者的关系，所以这里我们只梳理书院的研究成果，从中窥见士大夫和书院两者的互动关系。

(一) 民国时期

1. 有关全国性书院的宏观研究

民国时期学术界有关书院研究的成果主要有：胡适的《书院制史略》^①《书院的历史与精神》^②，他认为书院是“我国古时最高的教育机关”，书院和导师制“精神大概相同”，应该认真研究书院的历史。这一时期，研究书院的代表作还有：曹松叶的《宋元明清书院概况》^③、盛朗西的《中国书院制度》《宋元书院讲学制》^④、傅顺时的《两宋书院制度》^⑤、陈东原的《书院史略》^⑥《清代书院学风之变迁》^⑦、钱穆的《五代时之书院》^⑧、张君勱的《书院制度之精神与学海书院之建立》^⑨和周传儒的《书院制度考》^⑩等。

上述研究成果侧重于宏观上论述中国书院制度及书院历史沿革，在书院教育制度、书院和学术文化等方面，都提出了一些值得关注的看法。胡适认为书院有三种精神，即时代精神、讲学与议政、自修与研究。陈东原提出书院的灵魂是“自动讲学，不受政府干涉”与“反科举的精神”。^⑪傅顺时在《两宋书院制度》中将怀疑态度、人格精神、时代思潮、科学方法、自动学习和反对科举，归纳为书院的六大精神。盛朗西的《中国书院制度》，扼要地叙述了书院从唐朝至清朝的发展历史，考证了书院制度的源流和演变过程，书中涉及了士大夫和书院的关系，例如，张伯行在鳌峰书院讲学，耿介在嵩阳书院讲学，沈德潜在紫阳书院讲学等，但失之

① 胡适：《书院制史略》，载《东方杂志》1924年第21卷第3期。

② 胡适：《书院的历史与精神》，载《教育与人生》1923年第9期。

③ 曹松叶：《宋元明清书院概况》，载《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1929—1930年第10集第111—114期。

④ 盛朗西：《中国书院制度》，中华书局1934年版；《宋元书院讲学制》，载《民铎杂志》1925年第6卷第1期。

⑤ 傅顺时：《两宋书院制度》，载《之江期刊》新1卷第7期。

⑥ 陈东原：《书院史略》，载《学风》1931年第1卷第9期。

⑦ 陈东原：《清代书院学风之变迁》，载《学风》1933年第3卷第5期。

⑧ 钱穆：《五代时之书院》，载《贵善半月刊》1941年第2卷第17期。

⑨ 张君勱：《书院制度之精神与学海书院之建立》，载《新民月刊》1935年12月第1卷第7、8期。

⑩ 周传儒：《书院制度考》，上海励志书局1929年版。

⑪ 陈东原：《书院史略》，载《学风》1931年第1卷第9期。

简略。曹松叶的《宋元明清书院概况》利用统计学的方法,对宋元明清士大夫在书院的讲学情况进行了梳理,亦失之简单。

2. 有关地域性书院的研究

关于地域性书院的研究成果,如吴景贤的《安徽书院志》^①、王兰荫的《河北省书院志初稿》^②《山东省书院志初稿》^③、柳诒徵的《江苏书院志初稿》^④、刘伯骥的《广东书院制度沿革》^⑤等,这些成果大致上说还停留在对相关资料的整理阶段,缺乏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其中,柳诒徵的《江苏书院志初稿》是比较早的一部区域书院史,语言简洁,史料翔实。刘伯骥的《广东书院制度沿革》,是其学士学位论文,对广东省书院的演变、历史地理分布、行政组织及经费等问题均有较为系统的研究,是这一时期地域性书院研究成果的代表作,但遗憾的是,其中关于士大夫和书院的关系仍然没有多少论述。

大体而言,民国时期学术界的书院研究还处在初级阶段,虽然研究领域比较广泛,既有对书院历史宏观的研究,也有对地方书院的探讨,甚至有关于某个书院历史的考证,如吴景贤的《紫阳书院沿革考》,但是,研究方法比较单一,从社会史和文化史角度分析的不够,特别是对有关士大夫和书院互动关系的研究基本上没有涉猎。

(二) 1949年后

1. 1949年到改革开放以前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1979年,学术界的书院研究几乎无人问津,成果甚少,仅有《文史资料》刊登了17篇有关书院的资料与3篇论文。^⑥而我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的学者在这一时期则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主要有陈道生的论文《中国书院教育新论》《书院建设之源流》^⑦、

① 吴景贤:《安徽书院志》,载《学风》1932年第2卷第4—8期。

② 王兰荫:《河北省书院志初稿》,载《师大月刊》1936年第25期和第29期。

③ 王兰荫:《山东省书院志初稿》,载《师大月刊》1936年第29期。

④ 柳诒徵:《江苏书院志初稿》,载《江苏国学图书馆年刊》1931年8月第4期。

⑤ 刘伯骥:《广东书院制度沿革》,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

⑥ 邓洪波、周月娥:《八十三年来的中国书院研究》,载《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⑦ 陈道生:《中国书院教育新论》,(台北)《师大教育研究所集刊》1958年6月第1期;《书院建设之源流》,(台北)《思与言》1962年第2卷第3期。

丁肇怡的论文《书院制度及其精神》^①、孙彦民的专著《宋代书院制度之研究》^②、严耕望的论文《唐人读书山林寺院之风尚——兼论书院制度起源》^③、张胜彦的论文《清代台湾书院制度初探》^④等论著。上述成果不仅延续了对书院历史的传统研究路径，而且开启了书院教育、书院精神等新的研究领域。

2. 改革开放以后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书院研究蓬勃发展，许多书院资料被整理出版，学者们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出版了数部重量级的著作。

(1) 在书院资料整理方面，出版了赵所生、薛正兴主编的《中国历代书院志》^⑤，共16册，选收了中国历代的书院志、书院章程、课艺、学田志等史料115种，被公认为书院研究者的必读书之一。陈谷嘉和邓洪波主编的《中国书院史资料》^⑥，共3册，是这一时期很有特色的书院史料整理成果，该书按内容和时间先后分章编排，以精当、全面、系统的史料，展现了中国书院形成、演变、改制的发展脉络。邓洪波还编有一部《中国书院学规集成》^⑦，共3册，这是一部汇集我国历代书院学规、章程的著作，同样被视为书院研究者的必备书籍。上述工作为书院研究的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 在书院通史研究方面，有了一些成果，如张正藩的《中国书院制度考略》^⑧，陈元晖、尹德新、王炳照的《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⑨，李国均等人的《中国书院史》^⑩，白新良的《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⑪，陈谷

① 丁肇怡：《书院制度及其精神》，（香港）《民主评论》1959年第10卷第13期。

② 孙彦民：《宋代书院制度之研究》，政治大学教育研究所1963年。

③ 严耕望：《唐人读书山林寺院之风尚——兼论书院制度起源》，（香港）《民主评论》1954年12月号。

④ 张胜彦：《清代台湾书院制度初探》，《食货月刊》1976年第3、4期。

⑤ 赵所生、薛正兴：《中国历代书院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影印本。

⑥ 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史资料》，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⑦ 邓洪波：《中国书院学规集成》，中西书局2011年版。

⑧ 张正藩：《中国书院制度考略》，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⑨ 陈元晖、尹德新、王炳照：《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

⑩ 李国均等：《中国书院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⑪ 白新良：《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天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嘉与邓洪波的《中国书院制度研究》^①，邓洪波的《中国书院史》^②。这些著作从不同角度对书院进行研究，多集中在书院教学管理制度、讲学会讲制度、经费管理制度和供祀制度等方面。如李国钧等人的《中国书院史》，探讨了“书院”与“学派”的关系。白新良的《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对历代书院的数量、名称及和当时国家文教政策的关系等进行了统计和研究。陈谷嘉和邓洪波的《中国书院制度研究》，将书院分为书院类型、书院等级差异、书院职事类别、书院藏书及其管理制度、书院刻书事业、书院经费及其管理、书院的教育特点、书院考试制度、书院专科教育和走向世界的中国书院 10 章内容，对书院进行专题研究，是一部上乘之作。邓洪波的《中国书院史》，以书院的发展历史过程为主线，阐述书院始于唐、兴于宋、延于元、普及于明清的一系列史实，重点探讨书院学术、教育和管理制度，书中大量运用统计学方法及图表示例，使论述更加具有说服力，是一部全面、系统地论述中国书院历史的学术专著。上述书院研究成果中，由于是通史性质的著作，因此，尽管于士大夫对书院的贡献有所涉猎，但不够系统深入，而书院对士大夫的作用更是有待论述。

(3) 区域书院史研究方面，刘卫东、高尚刚的《河南书院教育史》^③、李才栋的《江西古代书院研究》^④、胡昭曦的《四川书院史》^⑤、吴洪成等人的《河北书院史》^⑥、赵连稳的《北京书院史》^⑦、马晓春的《杭州书院史》^⑧等，都是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成果，它们对某个省市历史上的书院沿革、地域分布、书院祭祀、教育、藏书等问题作了论述。区域书院史的研究不仅丰富了书院研究的内容，还有利于书院研究的细化和深化。由于是区域性质的书院著作，因此，于士大夫对书院的贡献涉猎较多，但仍然不够深入和系统，而书院对士大夫的作用同样论述甚少。

(4) 院别史研究方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城南书

① 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制度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

② 邓洪波：《中国书院史》，东方出版中心 2004 年版。

③ 刘卫东、高尚刚：《河南书院教育史》，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1 年版。

④ 李才栋：《江西古代书院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3 年版。

⑤ 胡昭曦：《四川书院史》，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⑥ 吴洪成等：《河北书院史》，河北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

⑦ 赵连稳：《北京书院史》，研究出版社 2014 年版。

⑧ 马晓春：《杭州书院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年版。

院、学海堂、钟山书院、格致书院等著名书院，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如关于岳麓书院的研究成果就有杨慎初、朱汉民、邓洪波的《岳麓书院史略》^①、杨布生的《岳麓书院山长考》^②、朱汉民的《岳麓书院与湖湘学派》^③。上述成果虽仍然侧重于论述士大夫对书院的发展作用方面，但于书院对士大夫的影响方面也有涉猎。

(5) 书院和传统文化研究方面，主要成果有杨布生、彭定国的《中国书院与传统文化》^④，该书将书院置于传统文化系统中，从教育、藏书、刻书、学术、三教合流、建筑艺术、档案事业、文化交流等角度对书院进行了全方位研究。胡青的《书院的社会功能及其文化特色》^⑤，从社会功能角度对书院进行研究，从家族文化、乡土文化、山林文化等视角来分析书院在知识传播、学术研究、社会教化、讲学考课等方面体现出来的文化传承意识和社会担当意识。丁钢、刘琪的《书院与中国文化》^⑥，重点研究了历代书院如何推进学术进步与儒家文化的传播。徐雁平的《清代东南书院与学术及文学》^⑦，这是一部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著作，系统、深入地研究了清代江苏、安徽、浙江等地书院的发展，论述了书院与学术及文学之间的关系。刘玉才的《清代书院与学术变迁研究》^⑧，研究了书院与学术的关系，考察了书院学术风气的演变过程。上述成果拓宽了书院研究的领域，并且涉及了书院教育对士大夫的价值观等方面的影响，但由于是附带论述，所以说研究并不深入。

(6) 士大夫和书院互动关系方面，研究成果主要有一些学者的论文发表，如湖南大学朱汉民的《书院历史变迁与士大夫价值取向》^⑨，肖永

① 杨慎初、朱汉民、邓洪波：《岳麓书院史略》，岳麓书社1986年版。

② 杨布生：《岳麓书院山长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③ 朱汉民：《岳麓书院与湖湘学派》，教育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④ 杨布生、彭定国：《中国书院与传统文化》，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⑤ 胡青：《书院的社会功能及其文化特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⑥ 丁钢、刘琪：《书院与中国文化》，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⑦ 徐雁平：《清代东南书院与学术及文学》，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⑧ 刘玉才：《清代书院与学术变迁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⑨ 朱汉民：《书院历史变迁与士大夫价值取向》，载《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明的《书院与地方社会的互动》^①，暨南大学王元林、林杏容的《明代西樵四书院与南海士大夫集团》^②，北京联合大学赵连稳的《窦禹钧及其书院问题考辩》^③等。这些研究成果，大多侧重于探讨士大夫阶层，或某个士大夫集团，或某个士大夫对书院的作用，而于书院对士大夫的反作用问题的研究尚不够系统和深入。肖永明先生的《书院与地方社会的互动》一文，对我国历史上的书院和地方社会的互动关系做了宏观的论述，该文认为：书院依托于地方社会而发展，依靠地方各种社会力量包括士大夫的支持；同时，书院又反过来对地方的学术发展、知识积累、人才培养、社会风习、文化交流产生很大的促进作用。这是目前不多的论述书院和社会互动关系的一篇典型文章，然而士大夫和书院的互动关系只是其内容的一部分，仍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开拓。

其实，书院的发展不仅得益于地方士大夫，更得益于上层士大夫的扶持；书院不仅对地方社会产生了影响，而且对上层社会也产生过很大影响。士大夫和书院的互动关系也不只是正面的、良性的，也有交恶的时候，这在明代比较突出。这些问题，都值得予以专门、系统地揭示和探讨。可惜的是，迄今为止，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尚未见到。

二 士大夫阶层的演变

既然研究士大夫，首先应该了解士大夫的历史。与书院相比，士大夫产生则比较早，逐渐形成我国传统社会中一支活跃的社会力量，一方面，这些人是国家政治的直接参与者；另一方面，他们又是社会上层文化、艺术的创造者和传承者。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士大夫也成为历史的名词。

（一）士大夫阶层的形成

士大夫是指古代官吏或有社会声望的知识分子，包括现职官吏、退休官吏和正在苦读诗书将来有可能担任各级官吏的人物。

春秋以前，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组成贵族阶级，大夫和士为贵

① 肖永明：《书院与地方社会的互动》，载《大学教育科学》2011年第4期。

② 王元林、林杏容：《明代西樵四书院与南海士大夫集团》，载《中国文化研究》2004年夏之卷。

③ 赵连稳：《窦禹钧及其书院问题考辩》，载《北京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

族阶级中的两个阶层。《国语》曰“大夫食邑，士食田”。说明二者身份地位相接近，后来逐渐把两者合称为“士大夫”。《周礼》说：“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是说王公是谋划治国之道的，士大夫是负责具体执行的。郑玄注“士大夫”曰：“亲受其职，居其官也。”^①可见，士大夫是有官职的人。

春秋以后，“士”从贵族中剥离出来，成为能言善辩的“游士”，成为知识人的通称，追求完美的道德人格、参政议政的社会责任和政治教化的担当，以及对博学多闻的追求，成为士人的人生价值观。在孔孟眼里，“士”首先应是文化人，同时又应是道义的化身，即《论语》所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士志于道”。先圣主张“学而优则仕”，就是欲给有作为的知识人一种出路，具备“弘毅”品格的“士”学习好了就去做官。孟子认为士人“尚志”，即“尚仁义”。

战国时期，士成为“四民之首”，《汉书》曰：“士农工商，四民有业。学以居位曰士，辟土殖谷曰农，作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货曰商。”^②一些士人凭借自身能力，进入卿相行列，即布衣卿相；大夫也不再世袭，其中的多数是由士上升而来的，正演变为官僚体系中的一个职位。但是，直到宋朝以前，“士”的地位和入仕途径总是变动的，许多“士”，“无以为衣食业”，纵然是孔子和孟子也莫能例外。

秦汉时期，关于士大夫的记载多了起来，西汉初期的士大夫概念比较模糊，可以指称贤士、官僚、将士。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士人由诸侯座上宾转而为朝廷官吏者日益增加。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武帝诏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此后，郡国每年举荐孝廉的察举制度便确立下来，昭、宣以后，士大夫的含义逐渐单一化，成为一个特定阶层的称谓，士大夫阶层逐渐形成。东汉光武、明帝对士人进行“吏化”改造，通经入仕成为士人主要的生存方式，士大夫阶层形成。余英时在《士与中国文化》中认为：“‘士大夫’这个名词古已有之，盖从封建制度中的‘大夫’、‘士’两称号逐渐演变而成……‘士大夫’，在汉初时主系指武人，但愈往后便愈有较广的社会涵义……至少在东汉政权建立之际，它已

① 阮元：《十三经注疏》卷42《周礼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267页。

② 班固：《汉书》卷24《食货志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17—1118页。

有我们现在所说的‘士大夫阶层’之意义。”^①在后来的反对宦官的斗争中，士大夫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士大夫纷纷立下家训，如诸葛亮《诫子书》《诫外甥书》，陶渊明《命子》《责子》《与子俨等疏》，颜延之《庭诰》，魏收《枕中篇》，颜之推《颜氏家训》等。这些家训的主要内容是立志修身、读书治学、和睦宗亲、为官处世，目的是在变幻莫测的政局下保家全身。

魏晋南北朝时期，直到隋唐以前，士人与官僚还没有结合起来，两者密切地结合起来是在科举制度实行以后，确切地说是在宋代进入科举社会以后。

（二）士大夫阶层的发展壮大

肇端于隋，确立于唐宋的科举选官制度，是我国官员选拔史上重要的里程碑，“一切以程文为去留”，士人通过科举考试便能够进入官员阶层，打破了世族门阀垄断官场仕途的局面，科举考试逐渐成为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士与官僚走向了合流的道路，通过科举入仕，成为士子的人生追求。

唐朝时期，是科举入仕的初级阶段，制度建设尚不完善，科举考试为上层士族控制，出身寒门的士人，即使有一部分如陈子昂、王叔文、刘禹锡、柳宗元等人进入到官员行列，但是，仍被排斥在政权之外。所以，唐末农民起义时，一些进士加入到起义军中，成为农民起义军的谋士。

赵宋王朝，重文轻武，加上大乱之后，新的政权重建，政府机构需要很多的文人官吏，朝廷对科举考试制度加以完善，采取了一系列限制世家权贵垄断科举的措施，实行公平竞争，这些措施有利于大量出身寒门的士人入仕，使很多士人通过科举考试，实现了做官的梦想，士大夫数量大大增加，士大夫阶层发展起来。根据香港中文大学李弘祺先生统计，在宋代全体文官 14860 人当中，前 30 年由科举及第的官员达到 7833 人，占到总数的 52.71%。^②还有人统计，《宋史》有传的 1953 名官员中，由平民或低品官出身而进入官场者占 55.12%。^③这在门阀制度下的隋唐以前社会

①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39—241 页。

② 李弘祺：《宋代的社会阶级与社会地位》，1985 年杭州国际宋史学术讨论会论文。

③ 陈义彦：《从布衣入仕论北宋布衣阶层的社会流动》，载《思与言》1972 年第 4 期。

是不可能的事情，说明中小地主及平民出身的中下层士大夫已经构成宋代士大夫阶层的主要部分，这些人对赵宋王朝充满了感激之情，参政议政的积极性与责任感空前高涨，把自身的命运和王朝的命运、国家的命运融为一体。

元代对科举考试制度不太重视，科举考试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因此，广大的士人被排挤在政权之外，加上民族歧视政策，终元一代，民族矛盾都比较尖锐。

明朝驱除鞑虏，光复中原，汉族士大夫对朱明王朝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明朝科举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也使众多士人进入官员行列。清代统治者入关之后，迅速吸收汉族文化，继续开科取士，笼络汉族士人，士大夫阶层进一步壮大，清朝后期，全国的士大夫人数达一二百万。

三 士大夫的人生价值观

（一）“三不朽”的人生价值观

修齐治平、“三不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些理念成为我国传统士大夫追求的人生价值观，而创办书院，可以教化社会、培养人才、传播学说，是士大夫实现理想的极佳途径。

对士大夫人生价值观产生深刻影响的人物是春秋时期鲁国大夫叔孙豹，据《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叔孙豹（？—前537年）出使晋国，晋国正卿范宣子问：“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谓也？”叔孙豹回答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这就是被后人称赞的所谓“三不朽”。唐人孔颖达在《春秋左传正义》中说：“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三不朽”中首先是“立德”，即拥有高尚的道德，创立普惠众人的制度，这是前提；其次是“立功”，即为国为民排除危难，建功立业；再次是“立言”，即将真知灼见著书立说，传于后世。“三不朽”被我国的士大夫奉为圭臬，力图在道德、事功、言论方面有所建树，传之久远，虽死犹生。叔孙豹提出的所谓“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说，是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的人生价值的基本取向，以后的思想家对此多